

忠·诚·无·悔

——我与中国足球

阎世铎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阎世铎著

忠诚无悔

我与中国足球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阎世铎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6

ISBN 7-5011-7534-9

I. 忠… II. 阎… III. ①阎世铎一生平事迹②足球运动—发展—概况—中国—现代

IV. ①K825.47②G84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346 号

忠诚无悔：我与中国足球

作 者：阎世铎

责任编辑：李 成

封面设计：余 工

封面摄影：余 工

美术编辑：伍民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3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95 千字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1-7534-9

定 价：29.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312) 2838225

目 录

第一章 引子	(1)
第二章 他山之石	(13)
沉默的巨匠	(13)
中国有足球吗?	(15)
危机中的帝国	(18)
先修渠后放水	(21)
足球教父	(24)
我的足球观	(26)
第三章 为明天工作	(29)
三大掣肘因素	(29)
重点转移	(31)
四轮驱动	(32)
严打球员改年龄	(36)
国足技术风格在哪里	(40)
青少年训练营	(42)
自己的教练员	(44)
选点边疆	(45)
08 奥运之星	(48)

欧洲训练营	(51)
巴特基辛根的橄榄枝	(52)
第四章 联赛风雨	(57)
如履薄冰	(57)
蝴蝶效应	(61)
外教也要“三个尊重”	(64)
媒体打分与“阎政治”	(67)
久逢不相识	(69)
“中超”的提出	(72)
破冰之旅	(75)
山城球迷带来的喜悦	(78)
足球要出大事	(80)
决不后退	(82)
电视辩论会	(86)
地下赌球在蔓延	(88)
捅了马蜂窝	(90)
中超在嘘声中开幕	(92)
第五章 第三种力量	(95)
中国足球裁判	(95)
拔出萝卜带出泥	(99)
龚建平走进我的办公室	(101)
杨明代表新华社采访	(104)
新闻通气会	(106)
大病后的大养	(109)
打铁还需自身硬	(111)
第六章 2002 世界杯	(115)
人是怎么成长的	(115)

南斯拉夫式的军礼	(117)
众人拾柴	(120)
那支雪茄烟	(122)
与米卢的争论	(123)
为米卢架起一座“桥”	(126)
婚礼上的握手	(128)
还有件事没做成	(131)
杀无赦，斩立决	(133)
王子的眼泪	(135)
打破怪圈	(137)
国王站起来又坐下	(139)
不眠之夜	(142)
乌兹别克斯坦的硝烟	(144)
双重使命	(147)
零的始终	(150)
大反思	(153)
米卢哭了	(156)
辞职报告被退回	(159)
 第七章 国奥队的失利	 (161)
世青赛的变奏	(161)
鏖战阿根廷	(163)
国青变国奥	(167)
武汉火急	(169)
歉意的泪	(173)
中伊之战	(174)
悲壮的告别赛	(177)
第二次辞职没有回声	(180)

第八章 哈恩的瞬间	(183)
拜托各位	(182)
人海中捞出哈恩	(185)
初考及格	(186)
南勇临危受命	(188)
终结之战	(190)
 第九章 冬天的玫瑰	(193)
难以愈合的伤痛	(193)
马上马下	(195)
张海涛浮出水面	(197)
第一次对女足教练组发火	(200)
雅典之行“流产”了	(202)
 第十章 国际关系	(205)
足球外交的转折	(205)
上帝的回报	(208)
错了就要认账	(211)
政治家的政治	(214)
种瓜得瓜	(217)
女足世界杯易地	(220)
艰难的亚洲杯	(222)
亚洲杯开幕式上的嘘声	(225)
 第十一章 温情时刻	(229)
希望海东当教练	(229)
与茂臻的渊源	(232)
让姑娘们去挣美元	(234)
两件破例的事	(237)
病在汉城	(238)

我的胆没了	(242)
珍贵的礼物	(245)
跟女足一起病倒	(247)
第十二章 俱乐部风波	(251)
“三枚炸弹”引发的前奏	(251)
中超出现“八级地震”	(253)
“权力”之争	(257)
执委会上的声音	(260)
我拍了桌子	(262)
倾听球迷意见	(266)
第三次递交辞职报告	(268)
第十三章 去德国	(271)
一年后的重逢	(271)
花园城市的除夕夜	(272)
为中国足球做最后一件事	(277)
尾声 无悔	(279)

第一章

引子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由于祖辈属于剥削阶级，从记事时起，我就感到父亲是一个非常和善而又谨小慎微的人，只知道钻研技术、埋头工作，从不与人发生争执，也很少有什么奢望。

或许是因为男孩的天性，或许是我的遗传基因中少了一点安静的成分，在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事就是上课，最厌恶的就是写作业，最想做的事就是玩。玩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的护城河边。

但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闯了一次祸。正是这次祸改变了我对学习的态度。

那一年，班上来了一位留级生，他仗着自己年龄大、个子高，经常找茬欺负班里的同学。一天早自习，这个同学向一位女生要早点吃。这位女生不给，他就动手抢，气得这个女生趴在桌子上哭了。

这个女生是位老红军的女儿，这位老红军前不久还曾给我们全校师生做过报告。过去，谁也不知道这位女同学有这样一位父亲，只知道她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同学，经常从家里拿一些东西，给班上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学用。

“这家伙太不仗义了，欺负谁也不能欺负她呀！”想到这，我放下手中的书，从座位上呼的站起来，走到那个同学面前说：“你欺负女生算什么能耐！”旁边一些男生也开始七嘴八舌地指责和讥笑起来。那个同学愣了一下，没说话，却突然转过身来，朝着我脸上狠狠就是一拳。

这一拳打得太突然，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顿时，我的眼睛模糊起来，鼻子一热，血顺着鼻孔流了下来。

过去在班里，我是属于贪玩的学生，但从来不骂人，不打架，但这一拳，我被激怒了，感觉心都要跳了出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旁边的同学纷纷向后退去。我的几个小伙伴却向我身边靠过来。我下意识地抬起手，示意他们不要过来。就在慢慢放下手的时候，我顺势抄起身边的一把椅子，使尽全身的力气，向那个同学的头上砸去。

那个同学的胳膊和头都被砸破了。一些同学一边喊着“打架了！打架了！”一边蜂拥向教室门外跑去。

一会儿，班主任、教务主任都来了，窗外的玻璃上也趴满了看热闹的人头。老师把我和那位同学领到了办公室，狠狠地训了我们俩一顿，并且说要请家长。

中午放学后，不知是谁的提议，我和几个小伙伴都没有回家，一块儿坐车去了香山。那是我第一次去香山。到了山顶，大家围坐在“鬼见愁”那块不大的石头下，开始七嘴八舌议论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心里一直在想：晚上回去怎么说？以后怎么办？在天近黄昏的时候，我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谁也不看，说了一声“下山”。这几乎是我整个下午说的仅有的一句话。

从香山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心急如焚的母亲在我通常放学回家的路口等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回家后，看到姐姐在学习，妹妹在玩，父亲依然在他的写字台上勾着图纸，这是我们家的生活方式。一切都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身边。我想这次该是大祸临头了，甚至做好了挨揍的思想准备，胆战心惊地把两只耳朵都竖了起来。

但出乎意料的是，我想象中的雷霆场面并没有发生。面色凝重的父亲也没有直接提及我和同学打架的事，只是平和地说：“你今年十一岁了。我十一的时候已经一个人离开了家，到外面学习、工作。人活着靠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知识的力量，一种是人格的力量。知识的力量不是拳头的力量，不是板凳。人格的力量也不是讲义气。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学习不好，你不会赢得尊重，将来也做不成什么事。现在，是你应该好好想一想的时候了。”

父亲说到这，话锋一转，像是用商量的口吻说道：“你不是很喜欢护城河那个地方吗？前些日子我也去过那里。那里有树、有草、有水，那不仅是个好玩的地方，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如果你能坐在那里看看书，效果一定也会很好。你不妨试一试。凡事都是习惯成自然。”我真没想到，护城河边我的乐园，已经被父亲“微服私访”过了。

父亲说完，看了我一眼，又转过身画他的图纸去了。我怀着惭愧的心情，蹑手蹑脚地离开了父亲的房间，一声不响地去写自己的作业。整个晚上，家里静得像没人似的。

父亲的宽容让我有一种虎口脱险的侥幸感觉，也有些感动。恰恰是这种宽容和感动让我立下了痛改前非的决心。第二天，我写完作业后，以背书为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过去那些朝夕相处的小伙伴，独自在河边找了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坐在那里开始念书。

这次打架事件确实改变了我对学习的态度。我上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上中学后，却几乎变成了一个“书虫”。我不仅不再想玩，甚至连体育课、音乐课都不怎么上，总是拿着语文、数学和俄语书在写、在算、在念。上大学的念头也第一次在心中明确地升腾了起来。

但没想到，在刚刚踏进中学校门不到一年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夜间爆发了。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情绪变得很低落，本来话语不多的他更不爱说话了。为了不让已经忧心忡忡的父亲再为我担心，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到护城河边背书。不到一个月，我就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

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也满腔热情地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之中。

根据母亲的建议，我下乡来到了大连市复县三台子公社小河东大队。这是我母亲的家乡，外公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一块肥沃的鱼米之乡。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民和知青依然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

刚到农村不久，赶上春耕挑秧苗。一担秧苗七八十斤，从育苗的地方到稻田要走近一里路。对农村的小伙子是件很轻松的事，但对我这个肩上从未

扛过东西的人来说，真是有些吃不消。我刚刚挑了两趟，肩就已经被磨得又红又肿。

看着远去的挑秧队伍，看着空旷的田野，这时十六岁的我真有些想家，但我转念一想：会死吗？不会。死不了就无所谓。我一咬牙又挑起了担子向前走去。

从1970年起，城市一些工厂开始在知青点招工，点里有的知青被招工回城；1972年国家恢复了大学招生，又有知青成了工农兵学员。招工回城对当时点里的许多知青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我一心想上大学，但我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奢望，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被招工或能够上学走的都是出身好、党团员一类人。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根红苗壮的同学，经常深夜躺在农村的土炕上，深深地陷入对自己出身的无奈和“非团、非党”的苦恼之中。

下乡第三年夏收农忙季节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我吃完午饭后，到村边的水坑去游泳，农村人管这叫“洗澡”。

我到水坑的时候，村里的两个年轻人已经在那里游泳了。他们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年龄也差不多。一个叫“桃耙”，另一个叫“海南丢”。我刚刚脱掉外衣，突然听见海南丢一声大叫：“妈呀！不好啦！”我顺着声音望去，只见海南丢正弯腰向大坑里张望。我赶紧跑过去看，只见桃耙的整个身子已经失去了控制，正随着坑里急促翻滚的漩涡翻转着。我看了一下身边什么东西都没有，要救桃耙，只能跳下去。

我看准了桃耙翻滚的位置，取好提前量，屏住呼吸，眼睛一闭，潜入水中。

很快，我就感到两只脚踩到了滑溜溜的肉上。我意识到桃耙有救了。我迅速将头露出水面，用最快的速度死死抓住了已经奄奄一息的桃耙，把他拖到岸边。

第二年，学校招生工作又开始了。村里、点里许多年轻人都报了名。我知道自己的政治条件不够，没有报名，每天还是一如既往地“锄禾日当午”。一天，村里一位干部告诉我，村贫代会已经决定让我参加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入学考试。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甚至怀疑这是在和我开玩笑。迟疑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问道：“这是真的吗？怎么会推荐我呢？”这位干部说，是桃耙的父亲在会上讲了我救他儿子的事情，才被获准提名，进入被推

荐名单的。

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救人，竟然也救了自己。

那年公社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有两类：一类是大学；一类是中专。大学只有两个名额；中专有十来个名额。

入学考试在公社的中学内进行。考官由招生办老师和公社贫代会的代表二十多人组成，近百名考生被分成几组，一个一个参加考试，考试的试题都是由这些考官自由提出。这种场面的考试，令每一个考生都非常紧张。

我知道上学的机会对我来说只有这一次，这一次将决定我的命运。考试还没有轮到我，衣服就已经湿透了。

终于轮到我了。考场是一间教室，教室内的桌子全部被搬了出去，沿墙坐着一溜二十多位考官。教室中间放着一把凳子。当时的气氛仿佛是法院开庭审问犯人一样。当我走向教室中间那把凳子的时候，紧张得可以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我刚坐下，耳边就传来一个比较温和的提问声音，我知道考试开始了。我从声音判断出第一位发问的考官是位老师，顺着声音望去，发问的是位东北工学院的老师。果然不出所料，这位老师向我提出了几个政治类的题目。在听完提问后，我的情绪一下子稳定了许多。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引用的一些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很长，我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来。甚至把前几年两报一刊的一些重要社论的时间、题目和主要内容准确地复述出来。在我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考官都露出了一种诧异的神情。

当我回答完第一轮问题后，东北工学院的那位老师接着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我有些难为情地说：“不是。”“你是团员吗？”我几乎是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不是。”说完便低下了头。这时，安静的考场传出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这些声音虽然很小，却无异于头顶上的一颗炸雷。我的脑袋一下子大了起来，心想，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下子完了。在这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出身不好，本人又不是党、团员，看来大学的门基本对我关上了。接下来是几位贫代会的农民考官又先后向我提了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我的考试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后结束了。

没有参加考试时着急，考完试后更着急。考试结果经过招生办和贫代会的研究，要在两天后才公布。两天里我坐立不安，魂不守舍，怕去想那个录取结果又忍不住时时去想。

度日如年的两天终于过去了，录取的张榜通知贴在了公社商店的墙上。我简直无法相信：在近百名考生中，我不仅被录取，而且还被排在了大学类录取的第一名！

看着这张贴在墙上的红纸，看着纸上自己的名字，我激动的心几乎快要跳出来。后来，公社招生办负责人告诉我，可以回去办理手续了，在家等通知吧。我没敢办理离开农村青年点的手续，担心其中会有什么变故。但我回到了北京，在家里等入学通知书。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不出门，一门心思盼着邮递员一天两次的送信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望眼欲穿。

终于在一天上午，接到一封写着名字的挂号信，我知道入学通知书到了。当我打开信封看到通知书时，却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惊呆了：入学通知书上写的是大连师范学校体育专业。这是一所中专学校！还是体育专业。

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想起当年在北京读中学时的一件事情：上中学后，立志上大学的念头，使我比较喜欢语文、算术和外语，不太喜欢体育课。因此，经常在上体育课时请假，借机回教室去做语文或算术作业。有一次，体育老师问我：“如果你当体育老师，学生总请假，你会怎么想？”我低声答道：“我绝不会当体育老师。”尽管我的声音很低，但这声音中确实含有一种对体育老师的蔑视。现在看着这份入学通知书，想着当年近乎于无礼的行为，仿佛感觉到这是命运的无情嘲弄。

不管这张通知书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命运和自己开的一次玩笑，总之正是它，把我领进了体育的大门，也从此确定了我人生的道路。

1984年，我从大连调回北京。在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后改为政策法规司），一干就是十五年，1999年初被调到总局办公厅工作。

十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翻阅着一大堆急需局领导签阅的文件，伍绍祖局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和我聊起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突然，绍祖局长问了一句：“你到足协工作怎么样？”他的声音不高，却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令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绍祖局长见我不做声，起身向门外走去。刚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说：“这个问题你再想想。”

没过多久，我去足协工作的消息上了报纸，尽管当时传闻去足协的人选

并不只我一个。一些同事和朋友打电话给我，询问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在这些询问中，有些人的态度是鼓励和支持，但更多的人是劝说和反对，认为足球是一块是非之地，何必冒险去趟这潭浑水啊！在办公厅当主任不是挺好的吗？其实，我也知道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都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但去不去足协工作，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的事。

2000年初的一天，我去袁伟民局长办公室请示工作。工作谈完后，伟民局长对我说：“调你到足协工作的事，听说了吧？”

我点头说：“是啊！可是我不懂足球，怎么调我去足协工作呢？”

“调你到足协是我的提议，我认为你这个人人品不错。虽然，你不是踢足球出身，但是这几年你也参与了不少足球的事，对足球多少也有一些了解。你现在要做好到足协工作的思想准备。”伟民局长历来话不多，在工作上很少开玩笑，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是从来不说。这是伟民局长的工作作风。

伟民局长接着说道：“足协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也不是个好地方。说它是好地方就是在足协工作很快会让你成为‘名人’，说它不好就是足协的工作很不好干。中国足球水平低，老百姓和球迷都不满意。你去足协工作不要着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需要时间，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足球出问题的时候，不论别人说什么，你要沉得住气，挺得过去。这是我给你打的预防针，你也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另外，你到足协工作要向俊生学习，要搞好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可以来找我。”当时，我对伟民局长有关团结的问题铭记在心，但对足协工作困难要有思想准备的告诫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很快，但足球始终没有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目标。这不仅成了全国球迷的迫切愿望，也成了当时国家体委工作的一个经常性议题。由于我在政法司工作，政法司的主要职责有两项：一是研究体育改革问题；二是研究体育法制问题。因此，我也经常参与一些与足球有关的工作。

把足球作为体育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足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促进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是九十年代初国家体委的一个基本思想。1992年，在中国足球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红山口会议在北京召开。从此，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中国足球改革开始了。

红山口会议后不久，一次，伟民局长找我，谈起中国足协准备制定一个足球十年改革与发展规划，问我“能不能和政法司的同志与足协一块儿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是伟民局长在用商量的口吻，向我讲述着一个决定。

一周后，我和政法司的周进强，便与中国足协开始了第一个中国足球十年改革发展规划的研究工作，并结识了当时的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俊生是位足球运动员出身的足球专家，年轻、干练、有朝气、有魄力，说话的声音总是在“高八度”上跳跃。在共同研究、规划和制定方案的过程中，俊生犹如我的足球启蒙老师，使我受益匪浅。

不久，俊生又向我提出，能否在1993年抽出一段时间，到全国的各个俱乐部做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考察，为来年制定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规则，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于是我们组成了三人调研小组，组长是足协原副主席杨秀武，组员是我和周进强。我们三人从大连开始，由北到南去了七个各种类型的俱乐部，与地方足协座谈，听取老足球工作者的意见。十个月的调研结束不久，我完成了调研报告的起草工作。中国足协决定，这份调研报告在第二年大连棒槌岛会议上宣读。

1997年与
王俊生、戚务生
一起在海埂基地
迎接新年的到来



1994年的大连棒槌岛会议很重要，因为这一年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正式启动的第一年，足球界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伍绍祖、袁伟民同志和所有的

足协副主席都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二百多人。

在会上，我将近万字的调研报告一字不漏地念完。《中国体育报》也在第二天用了整版的篇幅，把这份调研报告全文刊登了出来。

1997年腊月二十九，已经进入年关。北京大街小巷到处张灯结彩，仿佛天上刮起的风都带着过年的味儿。我也在盘算着和家人怎样度过这年的春节假期。这天下午，刘军打来电话，说：“袁局长准备在春节期间去云南海埂基地与备战世界杯的男足国家队一起过年，他希望你能够一同前往。”

大年三十下午，袁主任带着政法司张天白、宣传司邵世伟、刘军和我一同飞往云南海埂基地。在海埂基地除了国家队之外，还有甲A足球俱乐部的几支球队也在那里冬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足球运动员。

袁主任是一位工作不知疲倦的人，从大年初一到初六，袁主任每天召开座谈会，一个接一个地听取各足球俱乐部和国家队领队、主教练的工作汇报。汇报的时间从每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钟，下午一点到五点半，晚上从七点半到十点半左右。我们每天是三点一线，从宿舍到食堂，从食堂到会议室，后来，我半开玩笑地对袁主任说：“在海埂基地，运动员是一天三练，科研人员是一天三陪，您是一天三会……”

在一天吃过早饭后，我经过运动员餐厅门口时，听见有人在大声地议论着什么，我下意识地敞开着门口向里面望去，见国家队的几个队员正围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队员声音很大，也很激动地说：“在不在国家队里无所谓，如果不在国家队更好，有什么了不起的！回俱乐部挣的钱比这里还多呢！”接下来是七嘴八舌的附和声。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他们的激动情绪，但今年国家队正准备打世界杯的预选赛，如果一个国家队的队员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心态，他们还能打进世界杯吗？这件事像一片驱赶不散的阴影投在了我的心里。

1997年国家队没有打进世界杯。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种质疑铺天盖地，漫天飞扬，就像1997年冬天的那场大雪。国家队的失利也影响到了国内联赛，原本异常火热的甲A联赛在1998年迅速降温，各处原来爆满的看台经常性地出现大片空座，看球的、踢球的，心气儿都开始滑坡了，各大媒体关于足球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批评、谴责甚至是嘲弄的声音。